

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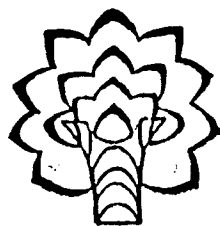
火热的小说世界

文天行 著

· 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 ·

火热的小説世界

文天行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川)新登字005号

责任编辑：苑容宏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苑容宏

火热的小说世界

文天行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75 插页4 字数211千

1992年1月第一版

1992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30册

ISBN7-5408-1500-7/I·12 定价：4.60元

●目 录

第一章	概论·····	(1)
一、	艺术追求与美学观照·····	(2)
二、	传统文化倾向·····	(24)
第二章	纵的轨迹·····	(53)
一、	走现实主义的路·····	(53)
二、	沉静的发展·····	(67)
三、	思索与收获·····	(84)
第三章	不同类型的作品·····	(105)
一、	纪实小说·····	(105)
二、	乡土小说·····	(114)
三、	讽刺小说·····	(128)
四、	浪漫色调小说·····	(143)
五、	通俗小说·····	(153)
第四章	作家分论·····	(162)
一、	论巴金·····	(162)

二、论茅盾·····	(179)
三、论老舍·····	(195)
四、论沙汀·····	(211)
五、论路翎·····	(226)
六、论艾芜·····	(242)
七、论骆宾基·····	(262)
八、论王西彦·····	(275)
九、论靳以·····	(286)
十、论萧红·····	(300)
——兼论端木蕻良	
第五章 “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抗日小说·····	(320)
后 记 ·····	(336)

●第一章 概 论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它继承了“五四”以来新小说创作的优良传统，真实地反映了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追求，为现代小说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司马长风从纯艺术的观点出发，对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否定，认为呈现的是凋零。应该承认，脱离社会现实、描写空中楼阁的作品的确凋零了，但这不是艺术的歧途，而是艺术健康发展的表现。艺术是人类头脑这个加工厂的产物，加工的原料是社会生活这枝叶茂密的大树，如何纯得起来？另外，抗战时期与和平时期还有不同，因为民族的兴亡、国家的前途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牵系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作为比一般人敏感的作家更具有难以压抑的爱憎感情。他们从各方面对社会现实作出反映，写出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作品。概之以凋零是不准确的，也是不正确的。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抗战时期小说就十全十美了。当时某些作家就严肃指出过它的不足之处。这一时期国统区小说创作

的特殊性表现在何处呢？可以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美学追求等方面进行分析，自然也要涉及到分期问题。笔者在《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一书中，将文学运动分为抗战爆发到武汉失守、武汉失守到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到抗战胜利三个时期，这对于小说创作也适用。

一 艺术追求与美学观照

(一)

作家在小说中表现什么样的思想倾向，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歌颂什么、鄙弃什么，与其所处的时代关系极为密切。可以说是时代发展提出的要求——不管你是否自觉意识到，从客观来看，都会成为小说表现的主要内容。中外小说发展史提供了这方面有力的证据。如果是在非常的历史时期，比如激烈的变革或者大规模的战争，表现尤为明显。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从具体的作家来看，时代主体意识的强弱并不是一样的，因此表现出来的对时代的关注就有了差异。进步作家能站在时代的高度进行观察，反映历史前进的脚步，不仅仅是顺应潮流，还会成为向前的助力。与其相反的作家，有对时代不同的认识和反映，自然也就有了相反的结果。至于中间作家，他们有着复杂的状态，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就其实质来看，关注社会生活的作家不可能中立，因为他们不可能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也不排斥在某个具体问题上采取不介入的姿态，但不介入并不意味着没有自己的观点，

只是因为出于什么考虑不便表露罢了。历史发展的主潮、前进的方向，毫无疑问地会在进步作家和有某种进步倾向的作品中得到表现。

抗日战争时期，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就是抗日争民主。这是时代的总主题，也是小说的总主题。这个总主题的两个方面——抗日与争民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就一具体作家和一具体作品来说，就不一定对两个方面作同等分量的反映，实际也存在对其中的一个方面不涉及的情况。总主题的产生不难理解，日本侵略者疯狂进攻，企图灭亡我国，而有光荣反侵略传统的中国人民没有、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开始大规模抗日斗争是必然的结果。要抗日，就要充分调动、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可是，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又严重束缚、压抑甚至扼杀这种积极性，争民主必然地要提上历史的议事日程。作为时代精神体现者的作家，怎么会不把这有迫切意义的主题表现在作品中呢？

抗日争民主贯穿了抗战时期小说创作的始终，但并不意味着总是那么一个模式，也存在着发展变化的情况。抗战初期，抗日反汉奸的作品就多于争民主的作品。作家们描写了芦沟桥事变、八一三上海抗战、保卫大武汉、广州的救亡运动等等，热情赞扬了燃烧着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精神，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恶和残忍，鞭笞了民族败类的卑劣与丑恶。最时髦的是写战争，不管熟不熟悉，都想在这个场地显一显自己的身手，以为这才能强有力地表现民族精神。作品呈现出一种奋发的状态。这是形势变化、作家奋发的结果。抗战以前，我国连年内战，仅30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就连续

发动了五次围剿，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抗战爆发以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各社会政治势力联合了起来，把赶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作为己任。形势的变化使全国人民振奋，也使作家振奋。再加上成立了全国性的各派作家的联合组织，明确规定了作家的社会职责，给作家以有力的促进，更出现了奋发向上、积极地有所作为的情形。作家们普遍认为，国内问题已经解决，唯一的就集中全力抗日，作品也作了如是反映。其中也含有幼稚的成分。这就是对统一战线内部复杂情况的忽视。统一战线是各社会势力的集合体，而国统区各级国民党政权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其反人民的性质，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逆流而动的情况。也有作家有清醒的认识，比如郭沫若、茅盾，就明确提出要揭露国统区的腐败现象，某些小说也作了这样的反映。不过，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少的。

这种情况在武汉失守以后逐渐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总主题中争民主的方面加强了，也有些作品写了战争，但不像武汉失守之前那样风靡一时了，前线主义热已经消退。作家将笔从前线扩展到后方，从城市扩展到农村，从内地扩展到边区。也正因为创作中加强了争民主的分量，就遇到了来自顽固派方面的阻力。图书审查日见严厉，剥夺了一些作品问世的机会。S·m的《南京》是获“文协”奖的仅有的两部作品之一，可一直未能出版，隔了半个世纪才与读者见面。不能问世的原因据说是太真实了。从作家1939年秋为该书写的《后记》中可以找到具体的注释：对国民党上层守卫南京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针砭，实际上是对最高决策者进行了批评。压抑民主的结果不是民主之火熄灭，而是燃烧得更旺。主题的这种变化是有其原因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挑起事端，排除异己，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上海、武汉、广州失陷后，作家们由于种种原因扩散到中小城镇和边远地区，客观上对民众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他们所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有了体验，对黑暗的制造者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可以看出，顽固派在对待各派政治势力，在对待人民群众，在诸如言论自由等等方面，都表现了专横跋扈的态度。这当然是不民主。不民主不仅不能调动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 的抗日积极性，还会压抑甚至扼杀这种积极性，对抗战是极为有害的。主题中争民主分量的加强完全出自于必然。

皖南事变后小说创作的主题又有了新的变化。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直接描写最近战事的作品比较少，较多的是回顾抗战初期所发生的重大战事以及它们的影响。还有些对战争并无深入了解的作家，又认为直接写反侵略斗争有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意义，于是就寻求新的途径，比如从影响方面考虑去描写反侵略的意义和侵略者必然失败的下场。争民主的内容在上一时期的基础上更为深化，占据了更为引人注目的地位。有的小说揭露了顽固派集权者制定和推行的法西斯路线以及制造的白色恐怖；不过，更多的是描写地方当权者种种罪恶：称王称霸、勾心斗角、残害百姓、唯利是图等等。也有的小说表现得曲折，写的是抗战以前，甚至更为久远的社会生活，揭露出不平的社会状况，反映了民众的合理要求，对争民主运动有 隐 寓 的作用。争民主的分量更为人注目不是偶然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不断倒行逆施，干了许多有损于团结抗日的勾当，虽遭到揭露、抵制、抨击，可他们不仅没有收敛，还变本加厉

反共反人民，最为突出的是1941年初制造了屠杀新四军数千抗日志士的血腥罪恶事件——皖南事变。此后，顽固派更加推行他们的专制独裁主义，进一步剥夺人民群众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监视并杀害敢于为正义而斗争的爱国者，还密谋策划进攻抗日根据地，妄图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尽管形势如此严峻，作家们并未放弃历史使命。在他们的小说中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揭露顽固派的独裁和罪恶，表现了对民主的追求。他们是吮吸“五四”乳汁成长起来的，又有鲁迅这个光辉的榜样在那里鼓舞着人们，追求未来的坚定信念、不畏强暴的硬骨头精神自然就十分突出。没有民主就争取民主，越压抑民主就越要争取民主。这也是皖南事变后小说创作中争民主的内容比以前突出和强烈的原因。

抗日争民主是小说创作的总主题，但决不意味着这就是一切。如果将抗战初期和后期小说创作的主题作一个比较的话，可以看出这样的趋向：从一元化向多元化扩展。抗战时期，尤其是1938年前，小说创作的主题为抗日反汉奸覆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不仅仅表现了抗日争民主，加强了争民主的分量，还出现了一些反映抗战前的封建压迫和剥削、矛头主要对准封建势力的作品。比如巴金和一些东北作家的小说就是如此。这当中自然有争民主的问题，要说联系，与现实也有曲折的联系，不过隔得毕竟较远。皖南事变后主题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加强和扩展。写抗日、写争民主、写反封建就不必说了，还有些小说对人自身进行剖析。主要剖析的并不是剥削者，而是那些无特权的人，特别是劳动群众。实际上是在探讨国民性的问题。鲁迅非常注重国民性的探讨，并在《阿Q正

传》中作了形象的反映。这时的探讨是那时的继续。这种探讨有以抗战现实为对象，更有以抗战前乡土风情为背景。他们写了数千年传统文化对炎黄子孙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凝聚在人身上的表现。写了人物思想、品格、气质、作风上优秀传统的闪光，也写了与时代不合拍的劣根性。

(二)

抗战时期的小说塑造了许多极富时代感的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有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的性格特征。如果不限于考虑单个的人物形象，如果把眼光扩展到小说人物群中去考察，那么就可以发现一些有普遍意义的特色。

战斗主要依靠的是军人，这包括穿了军装的正规军和没有穿军装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游击队。各阶层的支援当然十分重要，因为没有支援就没有胜利，但担负具体战斗任务的并不是一般的民众，而是那些持有武器的人。从这个前提出发，作家们很注意塑造军人形象，特别是抗战初期。但要塑造出成功的军人的典型也有相当的难度。写军人的作品不少，可人物形象多是轮廓。塑造得成功的也有，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与吴奚如《萧连长》中的主人公林青史和萧连长就属此例，但毕竟不多。其原因在于缺乏军队生活的根底，对军人思想、气质、作风的认识流于概念化的多，从深层了解的少。虽然也有些作家到了前线，但往往为的是宣传和收集材料，并没有深入下去，或者说深入得很不够。作家们也逐渐认识到概念地塑造决不会出现有血有肉的形象，而塑造军人形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又要求有血有肉的人物出现。要寻找解决难题的

突破口：在发挥生活优势的基础上塑造出成功的军人的典型。写生动的老军人困难就写新军人，也就是写才脱下老百姓服装入伍的军人，实际是过渡时期的人物。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绝大多数，军队中多数也是农村去的青年。这些青年从封闭的农村走向一个全新的天地，有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由于种种原因必然会出现许多趣事。一些作家把住过渡环节，竭力施展自己的才能。他们之所以着力于此，一则是这些作家多是在农村长大的，对农民比较熟悉，有生活基础；二则是不单纯写正规的军事生活，是将其与变了样的农村生活穿插起来写的，因此仅有的对军队生活的了解也还够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使人感兴趣的差半车麦秸形象系列。

这个形象系列主要表现的是小生产者意识、私有观念的改造。1938年夏，姚雪垠在《文艺阵地》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塑造了一个才参加游击队的庄稼人具体生动的形象，给当时的小说界以极大的启示和鼓舞，并得到茅盾的高度评价。这是抗战初期小说创作由塑造群像转变到塑造个别典型的信号，也引起了姚雪垠继续塑造这样的形象和一些作家塑造类似形象的兴趣。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姚雪垠又创作了《牛全德与红萝卜》，塑造了与差半车麦秸有许多相同点的典型。还有些作家也走了这样的路子。丰村《回炉货》中的王家富、张潮《独眼马》中的孙老五、王西彦《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中的担架兵……皖南事变后这样的形象就比较少了，给人印象深的是谢冰莹《毛知事从军》中的毛知事。这些形象的内涵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他们都来自农村，都是辛勤的劳动者，都缺乏起码的文化知识，都有比较狭窄的眼光和不良的习俗，所到

的都是新型的蓬蓬勃勃的战斗集体，必须有统一的思想、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行动。这自然会出现不协调与矛盾。虽然生活在与农村独家农舍迥然有别的集体之中，可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却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他们，有时还表现得很突出，比如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拿老百姓牛绳拟今后回家用等等。思想意识的不协调和矛盾是最基本的，也是其他方面不协调和矛盾的基础。部队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有严格的纪律，这些才着军装的农村青年头脑中却没有这根弦，即使时常叮咛也总是忘掉，回复到在农村的散漫状态。有这样的不协调和矛盾还不能说就有了差半车麦秸系列，因为这样的状态在转换环境时一般人都会产生。这个系列还有它的独特之处。由农村来的这些青年有许多应否定的方面。这些应否定方面并非大丑大恶，甚至可以说完全是生活小事上的处理不当，而这处理不当又和旧思想、旧习俗、缺乏最起码的文化与常识联系在一起，富于幽默感，具有轻松的讽刺性，表现出喜剧的色调。

抗战以前的小说就塑造了不少农村青年的生动形象，不乏懦弱者，也不乏反抗者，但没有出现过差半车麦秸这样的典型，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形象系列。它们的出现为人物塑造开辟了新的天地。熔全国作家于一炉的“文协”，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号召作家深入生活的密林，反映军人与农民以及其他人士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状态。不能说差半车麦秸与这个系列的出现就是这两个口号的结果，实际《差半车麦秸》的构思比“文协”提出这两个口号要早，但这并不排斥与抗战后逐渐形成的必须动员民众投入战争的思想有关，作为这个形象系列的出现与“文协”的推动也决不能

说没有关系，而它的出现无疑给“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提供了成功的示范，展示了可喜的前景。

中华民族是世界最古老的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就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也有惊人的四大发明，可发展缓慢，应该取得更为伟大的成就而没有取得。帝王将相和为他们服务的劳心者们，为了维护其统治提出自己的理论、宣传合于本身利益的思想并推行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不能说一无是处，得结合时代发展作具体分析。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他各阶级必然要受影响。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不会例外。劳力者历代都是次于人的，创造了文化又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文化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还会出现各种非科学的认识。由于受了个体生产和历史发展的限制，其认识本身也会有局限性。历史发展过于缓慢——就像有的东北作家所描写的那样，一代、一代、又一代，有着相同的思想与相同的生活，历史似乎都凝聚在那里了。劳动者身上的否定方面也在一代接着一代沉淀着。劳动者总是劳动者，必然有作为其基本的品质和肯定的方面，尽管它们往往和否定的方面相互混杂在一起，甚至使人难于区分。劳动者起着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肯定和宏扬他们的基本品质有助于历史的进步。所寻之宏扬点应与历史发展的阶段相结合，也就是说找的这个宏扬点比其他宏扬点更具有推动这个历史阶段前进的作用。抗战时期作家找的是原始强力。

路翎、骆宾基、王西彦、碧野、端木蕻良、易巩、艾芜等不少作家塑造了许多蕴含原始强力的人物形象。这种强力主要表现为自发的反抗。这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政治上受压迫，

经济上受剥削，思想上受愚弄，行动上受限制，无数条绳索把他们越勒越紧。有的人对使他们处于非人地位的罪恶势力有了感觉，但没有明确的认识；有的人还没有明确查觉什么使他们活得如此艰难，只感到周围存在使他们窒息的空气。实在忍耐不下去了，就产生了不满并开始了反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也有相同之处，即都想求得解脱，得到做人的基本权利，带有个性解放的成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就打出了个性解放的旗帜，并开始了不懈的追求，但多囿于知识者本身，范围还有些狭窄。原始强力中的个性解放意识是这种追求的扩展，也是这种追求所必然产生的结果。知识者的个性解放带有知识者的特点，理想的成分比较重。劳动者的个性解放带有劳动者的气息，现实的因素比较强。知识分子许多经济上有所依靠，而劳动者却靠不了谁，此刻不知下刻的命，要求是低的，可这低的要求也难于达到，有的还为此丧失了自己的生命。《饥饿的郭素娥》中的郭素娥就是为了争取满足自己身与心的饥饿而被残害致死的。仅管道路如此之艰难，他们也没有停止过追求。这种追求的强力带有山野的味儿，粗旷执著，还有点不顾一切。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田野，生活在山川，大自然养育了这样的美学情趣。当然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都是社会底层干粗活的人，干活的方式促进了粗旷执著的形成。还应该看到，他们缺乏文化，有不少愚昧之处，想的和做的都含有明显的不足。这些，和他们的原始冲击力会合在一起，实际也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原始强力虽然有积极的方面，可也有它的局限，是一种应该予以提高的力。实际上原始强力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逐渐走着向上的路。骆宾基《仇恨》中高占

峰的描写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作家写高占峰战前的粗旷、坚定、沉着、正义是偏重于人就该如此来进行考虑的，而抗战爆发，特别是侵略者将践踏家乡的土地时，他的原始强力就和反侵略斗争紧紧结合在一起，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抗日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了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动员的方式多种多样。从小说来看，也可以塑造各种人物来进行鼓舞。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劳动者自然是主要考虑对象。写他们的什么呢？以老爷式的姿态去动员他们，还是发掘他们自身强力去鼓励他们呢？显然后者最容易达到目的。要做到这点也不容易。首先要对他们有正确的认识，不能看得一无是处。抗战的特殊条件促成了作家与民众的接近、了解，历史形成的轻视他们的观点有所克服，为发掘原始强力创造了条件。实现原始强力为抗战时期小说人物塑造开辟了新的天地，特别是在抗战初期。另外，塑造这种性格特征的系列典型为塑造具有丰富复杂性格特征、内心世界的人物形象提供了借鉴，有益于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发展。

抗战有文武两条战线。武的战线的重要性为大家所公认；文的战线的重要性，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作用的估价，一度曾显得不足。抗战初期的投笔从戎运动，是知识分子爱国激情的表现，可也是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所轻视的反映。随着战争的进程，作为反侵略斗争不可缺少的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显得突出和重要。他们比缺乏文化的人对时局的发展变化更为敏感，也更有洞察力，而且，在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中，尤其在报刊杂志上，他们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罪恶、顽固派阴谋的主要力量。客观显示出来的重要性促使作家将其作为重要描写对象。